

桂世鏞

文集

(八卷本)

1

中国言实出版社

桂世鏞文集

第一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世镛文集/桂世镛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8

ISBN 987-7-80128-917-9

I. 桂...

II. 桂...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3122 号

责任编辑: 张红晨 詹红旗 侯景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8661(编辑部) 64924880(总编室)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sgyz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96 印张

字 数 2400 千字

定 价 580.00 元(全八卷) ISBN 978-7-80128-917-9/D·258

出版说明

桂世镛同志是我国经济战线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优秀领导干部,卓有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一生中写下大量文稿,发表过很多文章和讲话。这是一笔富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将这些文字编辑出版,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桂世镛同志的缅怀和纪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桂世镛同志的遗愿:使这些文字成为有用的参考,有助于对建国以来经济思想发展的回顾,有助于经济学同仁和后来学者的研究,有助于政策咨询和政策制定的工作。

这部文集,选稿起自一九五八年,迄至二〇〇三年,汇编了作者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逝世之前,所写文章和所作报告的主要部分。所选文章大多曾在公开报刊发表,也包括少数写作思路提纲;所选报告大多曾在各类会议讲用,也有一些属内部研究文稿。作者还曾专为某些篇章撰写过重要的注释。有些文稿系与他人合作,收录前已征得有关作者的同意。

文集分八卷,共计 246 篇,约 240 万字,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也为了反映作者当时的理论观点,我们保留了所收文章的原貌,仅就文

字、标点、数据和史实进行统一订正,报告和讲话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每篇文末,均有版本或稿本情况的简要说明。

作为桂世镛同志生前的学生和工作助手,张红晨同志承担了文集编辑整理的主要工作。湖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本社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七月

桂世镛小传

桂世镛,男,汉族,籍贯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1935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桂世镛两岁时随父母回到老家南浔。这是一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南水乡古镇,鱼米富庶,景色秀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六岁时父母把他送到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式启蒙教育。1945年夏他人南浔雪庄小学,旋即转到南浔中学附小;1947年进南浔中学学习,1950年夏初中毕业。

1950年10月,他考入了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材料管理训练班(后改为北京石油学校),来到了祖国的伟大首都。在这里,他一面参加劳动建校,一面学习《劳动创造人》、《中国革命史》,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认真进行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思想总结;接着,由石油管理总局有关工程师和干部讲授,简要学习了从石油勘探到采油、炼油、运输、储存、销售等生产技术知识和有关的经营管理知识。学习期间,他积极追求进步,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劳动模范,还担任学生会主席等社会工作。1952年毕业后,他被派到甘肃玉门油矿,实习了三个月。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为了加快培育建设人才,放宽了入学的工龄限制,招考在职人员入校学习。经组织推荐,这年9月,年仅17岁的桂世镛以优异成绩考入人大,成为经济计划系工业经济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刻苦、勤奋、踏实,喜欢独立钻研问题,也喜欢讨论和帮助同学,功课成绩门门优秀,成为全校少有的全优生。他在二年级时被评为学校模范生,受到通

报表扬,四年级时被评为校“三好”积极分子,1956年7月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69年11月,担任过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工业经济组秘书。他先后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和马洪主编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写作,在《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撰写了有关工业企业责任制的论著,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有关经济问题的讲座。

这一时期,他着重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劳动工资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体系方面,他与何建章等同志合作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问题,主张不是从概念、规律、政策出发,而是从经济过程的分析入手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一个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分篇的体系。这个体系,突破了传统的框框,在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受到孙冶方同志的重视,被称为“何桂体系”。此后,在孙冶方同志指导下,这个体系经过修改充实发展为由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企业管理方面,与他人合作,深入研究和分析了国营企业的性质和任务、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相对独立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建立企业管理学的科学体系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经济核算方面,他提出了企业进行综合资金核算的必要性,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资金利润率范畴存在的客观依据。他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责任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较早地提出从经济上确立各级责任制的观点,主张在企业之间推广经济合同制,实行等价交换和经济赔偿制度。他还对按劳分配思想的发展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由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治学严谨,富于探索精神,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达到很高

的学术造诣。

正当他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努力攀登的时候,1964年10月经济所开展了批判孙冶方的“四清”运动。由于赞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积极支持和参与孙冶方的学术研究和专著写作,他与孙尚清、何建章、刘国光、董辅初等同志一起,被划为“孙冶方一伙”,列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八大金刚”之一,受到近一年的批判审查。1965年秋下到北京房山县农村劳动,参加“四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回到经济所接受审查。

1969年11月,他同爱人和孩子全家下到石油工业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3月回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整党。同年5月借调到国家计委劳动局和研究室工作,先是参加劳动工资问题的调研,1975年后参加《工业二十条》的起草工作。1976年“批邓”时,这个《条例》被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猛烈批判。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他的档案得到清理,运动中的遗留问题才完全解决。

1977年7月,他正式调入国家计委工作,直到1987年3月。其间,1978年9月起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起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82年10月起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国家计委委员兼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科学的空前繁荣。他在继续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同时,更直接地参与了许多宏观经济管理实际工作。通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碰到的诸多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的研究,他对基本国情及其对经济成长的影响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了解。他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力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实践经验中探索规律性的认识,写出了一

批质量较高的有独立见解的论著,受到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工作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参加许多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他提出过很多好的观点和有益的建议。例如,他主张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建立企业基金,利用价值规律和加强经济核算,调整农、轻、重比例,改善积累与消费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从我国国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等。

1987年3月,他调至人民日报社工作,任副总编辑。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8年6月,他重返计经委机构合并后的国家计委工作,任重组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计委秘书长、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9月至1993年11月兼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89年12月起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7月起任国家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8月至1994年7月兼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1990年12月起兼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7月起兼任全国企业管理干部培训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国家计委这个综合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部门工作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先后参与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五”、“六五”、“七五”和“八五”等五年计划、各年度计划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工作,组织和主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经济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参与并见证了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从启动到展开的全过程。

1994年7月,他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

部长级),受命主持国家行政学院的日常工作,建设新校区、组建教职工队伍并着力推进学院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为学院上规模、上水平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一国家行政学院全面创业的时期,他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办学方针,主持修订、完善、落实学院机构编制方案,组织制定了学院办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断探索培训模式,完善教学方案,特别是紧紧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举办了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他重视师资队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提出学院工作重点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全面加强软件建设。积极倡导开放办学,与国外一些著名的政府管理学院和企业建立学术交流及合作培训关系;借鉴当代公共行政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推动我国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他艰苦创业,积极开拓,辛勤工作,为国家行政学院建设和高中级公务员培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98年3月在国务院朱镕基总理主持工作的新一届政府组成后,桂世镛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直到2001年2月。在这三年中,中国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特大洪涝灾害的考验,中央政府相继推出并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等重大改革措施。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事机构,国务院研究室承担了大量的文件、讲话起草和课题调研工作。作为主要负责人,他团结带领研究室领导班子和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履行国务院研究室的综合性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和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职能。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重要文件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报告等重要文稿的起草;主持和组织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许多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政策建议;努力确保完成国务院领导交办的事项;重视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全室的工作质量和水平。他殚精竭虑,奋发图强,鞠躬尽瘁,圆满完成了任上各项使命。1998年3月至1999年11月他还兼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2001年3月,他被增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并被聘任为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办公室特邀顾问,同年9月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这一期间,他参与和负责组织了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农村税费改革和全国政协委员视察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有关工作;主持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等调研,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他还结合新形势,主持提出了十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的新思路,并积极开展工作。

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学界领导人,桂世镛还担任了一些学术和社会职务。包括:全国哲学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会长,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和中国投资协会的顾问,国家计委学术委员会和中国经济学术基金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国家计委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济系列)评委会主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经济研究》编委会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系的兼职教授。

桂世镛理论联系实际,在做好综合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实际工作的同时,勤奋治学,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被誉为“学者型官

员”。他的专业和擅长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企业管理与工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公共政策研究,重要文件起草等。他参与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党中央政治报告和多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多次参与及负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重大文件的起草工作,多次参与及主持国家计委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他参与撰写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和马洪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2 月版);著有《论调整、改革与效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与稳定》(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版)、《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等三部论文集。合著《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等。

他主编了三十多部经济类著作,包括:《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论指导性计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七五”计划讲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版)、《计划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获 1987 年度中国图书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学习七届人大会议文件辅导读本》(沈阳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深化改革 促进建设——学习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辅导材料》(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学习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学习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学习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精神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走向新世纪的伟大纲领——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讲话》(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学习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精导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学习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4 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贸投资指南》(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中国经济调节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学习中共十四大精神辅导讲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新时期新观念新问题释义》(新华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学习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文件辅导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宏观经济与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中国市场体系的培育与管理》(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特区开放区的经济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重返关贸总协定后的中国经济》(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中国计划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4 年 2 月版)、《当前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调控》(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邓小平行政理论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中国农民基本常识读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WTO 与政府工作手册》(新华出版社 2002 年

4月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他发表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论文,主要包括:《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合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提高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论进一步调整的特点与意义》(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论经济调整的目标、阶段和措施》(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10期)、《关于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1984年第5期)、《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11期)、《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20期)、《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总体部署》(载《红旗》杂志1987年第24期)、《继续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载《求是》杂志1990年第8期)、《正确实施产业政策,搞好经济结构调整》(载《求是》杂志1991年第2期)、《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局面》(载《求是》杂志1997年第19期)、《在改革开放中培育、发展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载《解放日报》1997年9月29日)、《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载《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6月)、《深化计划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载《宏观经济管理》1998年第11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任务》(载《改革开放20年》,学习出版社1998年9月版)、《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载《经济日报》1998年11月26日)、《经济体制改革:半世纪探索与跨世纪展望》(载《共和国50年》,学习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谈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载《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4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载《求是》杂志1999年第20期)、《全面学习和掌握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载《紫光阁》杂志1999年第11期)、《向深层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载《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1日)、《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载《学习时报》2000年11月6日)、《九十年代的宏观调控》(合作,载《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9月版)等。

2003年11月28日,桂世镛同志走完了他奋斗、求实、奉献的一生。12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北京电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经济战线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优秀领导干部,著名经济学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桂世镛同志,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桂世镛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乐泉、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周永康、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曾培炎、王刚、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傅铁山、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王忠禹、廖晖、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巴金、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霍英东、马万祺、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郝建秀、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黄孟复、王选、张怀西、李蒙和李德生、张劲夫、段君毅、黄华、彭冲、廖汉生、谷牧、马文瑞、郑天翔、杨白冰、丁关根、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王汉斌、张震、陈慕华、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吴阶平、彭珮云、

韩杼滨、吴学谦、洪学智、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胡启立、陈锦华、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邓力群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定的《桂世镛同志生平》对他作出如下评价：

桂世镛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处理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文字水平，熟悉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方面成绩显著，在经济界、理论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

桂世镛同志具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和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他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注重抓大事、议大事。善于团结同志，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特别是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桂世镛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满腔热忱，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在病重住院期间，仍关心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他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任劳任怨，忘我工作，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桂世镛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胸襟坦荡，光明磊落，谦虚谨慎，节操高尚。他坚持真理，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严格要求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桂世镛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追求、甘于奉

献、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一位优秀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桂世镛同志永垂不朽!

(国务院研究室张红晨根据有关档案资料整理)